从小说到电影的主题嬗变
——论《万箭穿心》的影视化改编

彭孝华

（湖南大学，湖南省、长沙市，410000）

摘要：本文在方方创作溯源的基础上，从三个方面阐述了《万箭穿心》由小说到电影的主题嬗变，并最终得出结论——电影《万箭穿心》虽看似是女性形象的展现，但其叙事背后的控制力量仍是男权话语中心。

关键词：《万箭穿心》；主题；嬗变

中图分类号：J9　　文献标识码：A

方方的小说《万箭穿心》来源于朋友给她讲的一个故事：一个女人在丈夫因下岗而跳楼自杀后靠做苦力养活公婆和儿子三人，含辛茹苦，忽略了公婆对儿子的影响。儿子接受了公婆关于“如果不是你妈，你爸就不会死”的观念，对母亲一直怀有怨恨，成人后对母亲十分冷淡。她虽然扛得住艰难的生活，却扛不住儿子的仇恨目光。[1]在听了这件事后，方方受到极大的震撼。一天，她又在报纸上看到一篇介绍汉正街“女扁担”的报道。由此，她在脑海中慢慢构建出李宝莉这个人物形象，进而搭建出了《万箭穿心》这篇小说。小说的核心骨架也确实遵循了其故事来源。

小说最初发表在《北京文学》2007 年第 5 期，几乎被所有选刊转载并入选当年度多种中篇小说选本，进入年度中篇小说排行榜，也获得《小说月报》百花奖，[2]“是能代表其写作特点的也较出色的一部”，[3]也是“作家本人最愿意向读者推荐的作品”[4]。在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的评选上，《万箭穿心》最终败给了方方的另一部小说《琴断口》。有人发短信向方方表示祝贺，方方回复说更喜欢《万箭穿心》。[5]“后来我读了《琴断口》之后，感觉方方说的并非客套话，《万箭穿心》确实比《琴断口》更有深度和力度，因而也更加厚重。也就是说，《万箭穿心》比《琴断口》更应该获得鲁迅文学奖。从两者发表后迄今在社会中不同的反响看，也进一步印证着这一判断。”[6]

在小说《万箭穿心》中，方方聚焦女主角李宝莉的生存困境，挖掘造成其生存困境的深层原因，并进一步反思和探索现代社会中女性的群体命运和生命价值，对女性的生存境遇给予了高度的投注。小说于 2012 年被改编成电影。电影上映后，票房虽不理想，但却收获了非常不错的口碑，评论界普遍好评“在对电影文学性的回归和对电影现实主义的回归上都是华语片的佳作”，并得以入围 2013 年北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片单元 (只有两部国产片)。[7]如

---

[1] 刘川鄂，黄耀芳. 《万箭穿心》：小说与电影[J]. 扬子江评论，2014，(03)：26-29.

[2] 刘川鄂，黄耀芳. 《万箭穿心》：小说与电影[J]. 扬子江评论，2014，(03)：26-29.

[3] 吴雁琴. 方方小说《万箭穿心》的叙述策略[J]. 名作欣赏，2012，(21)：50-51.

[4] 金莹.“纵是万箭穿心,也得扛住”[N].文学报，2007-08-02.

[5] 刘川鄂，黄耀芳. 《万箭穿心》：小说与电影[J]. 扬子江评论，2014，(03)：26-29.

[6] 后窗四人谈之八.《〈万箭穿心〉之电影与文学》[N].新华副刊.2012-12-20.

[7] 刘川鄂，黄耀芳. 《万箭穿心》：小说与电影[J]. 扬子江评论，2014，(03)：26-29.

此，小说和电影的质量，在读者和观众那里都算得到了认可。但若将小说和电影进行对比，我们会发现，从小说到电影，其主题已悄然发生了嬗变。

一、从“女人”的宿命式悲剧到“女人”的个体悲剧

小说中，方方塑造出李宝莉这个悲情女主角，更像是以她为代表，指向了女人的一种宿命式悲剧。因为，小说中的女人，不管是何嫂，李宝莉的母亲，还是李宝莉自己，都过得并不如意，都在生活的苦难面前不断地坚守着一个字——忍。何嫂没了丈夫，靠担扁担撑起整个家，整日风里来，雨里去；李宝莉的母亲，虽和丈夫相处还算和洽，但“忍”的生命哲学就是她传授给李宝莉的立身之道。由此可见，李宝莉的母亲，其一生也并未过得很幸福；而李宝莉自己呢，则在马学武死后，将女人的悲剧诠释到了极致。

李宝莉一直都很崇拜自己的母亲，她的很多认知形态都来源于她的母亲。母亲在李宝莉每次身心俱疲时的劝告，都在不断强调一个“忍”字。但“忍”到最后，李宝莉也并未换来好的人生结局，反倒家破人亡。这样一分析，我们似乎就看到了女人的悲剧在一代代地被轮回演绎着。从李宝莉的母亲到李宝莉，这是一种直接的女性悲剧传承。

至于李宝莉的婆婆，她虽为女性，但在小说中，她的人物塑造得以完成并非基于她的女性身份，而是她作为李宝莉的婆婆的这个身份。在小说中，李宝莉的婆婆充当的角色，是男权社会的帮凶和维护者，而并非女性。自马学武死后，儿子小宝内心就对李宝莉积攒了怨恨，但这种怨恨的蓬勃滋长，跟李宝莉公婆背后的教唆也密不可分。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李宝莉的公公很少亮相说话，始终在充当“恶人”角色，与李宝莉针锋相对的，是李宝莉的婆婆。而这个“恶婆婆”的形象，是绵延数千年的男权社会的产物。在男权社会下成长起来的“恶婆婆”，她们在一开始，并非就都是“恶”的。她们在为人儿媳的路上，也曾历经艰辛，受尽折磨，待到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后，就已然被男权社会所同化，成了封建家长的化身。她们拿过从婆婆手里继承过来的法杖，登上“婆婆”的位置，变本加厉地对后来的儿媳施以威严和压制，以此作为自己过去受尽奴役后的心理补偿。而李宝莉的婆婆，无疑就是这其中之一。她从一登场亮相，就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属性。在搬至儿子家中居住，儿子马学武撂下“这里我做主”的话后，她立马就接过话，“说当然，这里当然该由我们马家的人做主。”[8]后续，儿子死后，李宝莉靠担扁担养活一大家子，可谓是刀尖上讨生活，但婆婆对此也毫不领情，先是立马叫李宝莉将房子过户到孙子小宝户下，后是暗地教唆孙子小宝憎恨其母，将孙子小宝同化成男权社会文化机制的执行者，帮助小宝在家中建立男权社会机制，直至最后小宝将母亲李宝莉彻底赶出家门。

可在电影《万箭穿心》中，导演简化了人物关系，剔除了李宝莉的父母和马学武的父亲，

[8] 方方. 万箭穿心[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221.

只留下了马学武的母亲。剔除了李宝莉的母亲，就切断了小说文本中李宝莉原有的认知源头，也让观众无法看到李宝莉在继承母亲的处世哲学后依旧落入男权社会漩涡的悲剧轮回。而且，电影中婆婆的形象被改写，她失去了小说中的“恶”，对李宝莉的态度，虽算不上好，但也不咸不淡，并不似小说中的那般恶毒刻薄。电影中，她也并不存在背后引导小宝憎恨其母，同化小宝的意识形态的嫌疑。甚至，在小宝做出要将母亲李宝莉赶出家门的决定时，她也试图劝阻过。这样一来，小说中，“恶婆婆”在李宝莉和儿子小宝的关系恶化中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就被完全抹去了。小宝对母亲李宝莉的怨恨，就纯粹变成了内心自发的一种仇恨——仇恨母亲逼死了自己的父亲。这样，埋藏在小说文本中的“‘女人’的宿命式悲剧”的主题线就被隐没了。电影就只是变成了“一个女人的个体悲剧”。但这个悲剧依旧是只属于女人的。因为，如果将李宝莉的性别倒置成男性，即一个男性在发现妻子出轨后，报警，致其自杀，心虚地隐瞒了事情的真相，那么他也有可能面对来自孩子的不理解和不原谅，但他绝对不会在自己含辛茹苦地赡养岳父岳母，将孩子一手抚养成才后，被岳父岳母及孩子以“外人”的身份逐出家门。[9]而身处在男权社会中的女人，其一生最大的悲剧莫过于，无论身处何方，她都无法取得自己独立的主体身份。尤其是外嫁他人后，对于娘家，她是外人；对于婆家，她也依旧还是外人。她依附于他们存在，但她对他们而言，至始至终都是外人。

二、小说中关于跨阶层结合的悲观论断被稀释

古语云：“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若从这个角度来说，那么“屠狗辈”和“读书人”的结合就必然会成为一场爱情悲剧。而李宝莉和马学武就恰恰是典型的工人之女和知识分子的结合。对于这种跨阶层的结合，方方在小说里给出了态度鲜明的悲观论断。

小说中，阶级身份的鸿沟不止一次地得到强调。结婚的时候，李宝莉跟马学武说，

我姆妈这个人就是强。做什么是什么。放哪里就是块金子。李宝莉词不多，又用了金子两个字。结果被马学武嗤了一下，说你姆妈要是金子，汉口还不成了个金矿？走到街上，随便捉个人，都比你姆妈更像金子。起码，文凭高些吧？[10]

在搬新房前，李宝莉回娘家吃饭，饭间口沫横飞，一桌子的人都不免沾了火星。对此，李宝莉的爹妈倒是惯了，“可李宝莉的小妹在电脑公司当会计，一向觉得自己是白领，便对李宝莉的做派很厌烦。”[11]期间，两人发生了口角，小妹起身离开。过后，“李宝莉的母亲说，哎呀，她自打读了个中专，以为自己是文化人了，瞧不起我们。莫理她，只当她是放个

[9] 参考知乎“如何评价电影《万箭穿心》？”答主李婉儿，详见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0951553

[10] 方方. 万箭穿心[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201.

[11] 方方. 万箭穿心[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198.

响屁。”[12]

从以上两个地方，我们都可以明显看到，小说中的他们，都有着明确的身份阶层认知，也都自觉地划分了身份阵营。小说中，李宝莉的父母同为工人，都没什么文化，相处融洽；马学武的父母，都是中学教师，有着较为统一的意识形态认知（从对待媳妇李宝莉的统一态度便可以看出），感情甚笃；而李宝莉和马学武呢，一个是没文化的工人之女，一个是有文化的读书人，两人的结合最终以悲剧收场，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小说中，方方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有着明确的阶层意识认知，将阶级分化进行了合理化。但在电影中，阶级身份没有得到直接的有力彰显。电影只是用汉正街和那座“万箭穿心”的高楼形成两种对峙的生存空间，在客观层面上含蓄地形成一种文化的修辞隐喻。而且，电影中，作为故事配角的李宝莉父母、马学武父亲的被抹去，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电影中主人公的阶层属性，弱化了小说中原有的“关于跨阶层结合的悲观论断”这一主题。

再者，小说突出强调了马学武是在升为厂办主任后，才开始发生转折性的心理变化，开始思考“这个婚姻带给他的是幸福多呢还是痛苦多？”“这个问题他以前从来都没有想过。”[13]，他也开始敢跟李宝莉顶嘴，开始阴阳怪气地跟李宝莉说话。他的这个心理转变节点，非常类似于古时候的文人十年寒窗苦读，一朝中举后，便“从此萧郎是路人”。“读书人”的寡情薄幸，也于此得到彰显。但马学武的这些心理变化和言语表达，在电影中都被删去了。同时，电影中，李宝莉因搬了新家，对丈夫马学武怀有的感激和崇拜，也被删去了。观众在电影中看到的，只有马学武在这段婚姻中的一味妥协忍让和李宝莉的强悍霸道，以及她对农村人马学武的内心轻视。由此，马学武的出轨，看起来便不再像是读书人的“负心汉”表现，也就更能博得观众的同情和谅解。小说中的原有人物阶级属性，在电影中就这样被稀释掉了，而李宝莉的悲剧，也就嬗变得更像是一场性格悲剧。

但电影中建建的人物角色改编，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上述不足。小说中的建建，为人老实本分，多年来对李宝莉始终感情如一，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但电影中的建建虽不失仗义，带着街头混混特有的流氓痞气和精明世故，在与李宝莉的感情纠缠中，也有着试探与索求。电影结尾安排李宝莉和建建走到一起，也说明了对于李宝莉这样的女人，只有与她同样强势的、身处同一阶层的建建才能与其匹配。这样的一种两性结合，较小说而言，更为贴近社会现实，也更贴近小说中的“将阶级分化合理化”的主题。

三、小说中男权社会对新型女性的打压被消解

小说中，李宝莉的“刀子嘴”使她看起来与传统的贤良淑德的妇女格外不同，这使她拥

[12] 方方. 万箭穿心[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198.

[13] 方方. 万箭穿心[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197.

有着“非女人化”的性格特点。李宝莉的“刀子嘴”在一定程度上僭越了男权，但她在本质上却依旧是一个受到男权社会意识形态支配的女性。马学武在世时，她依附于马学武和儿子小宝而存在；马学武去世后，她则将生活的重心移到了儿子身上，依附于儿子存在。所以，小说中，李宝莉一开始姑且只能算是一个具有些许女性意识的新型女性。李宝莉的女性主体意识，是在最后被儿子赶出家门，受尽万箭穿心之痛后，才得以找回。在那个时刻，她开始明白“人生是自己的，不管是儿孙满堂还是孤家寡人，我总得要走完它。”[14]故此，小说的主旨也在最后升华到了女性主义的弘扬层面，彰显了女性作家方方对男权社会下的女性命运的关注和探索。

与小说不同的是，影片中呈现出的李宝莉的人生悲剧，更像是她咎由自取后的应得惩罚，而并非是男权社会对新型女性的打压所致。观众在影片中只看到了马学武的被逼无奈，忍气吞声；看到了李宝莉对婆婆的冷漠以待，泼辣蛮横，却看不到小说中马学武是在升官换房后才开始发生转折性心理变化的重要事实，看不到李宝莉的“刀子嘴菩萨心”，更看不到李宝莉的“虽没什么文化，但却会想理，想通了，也就认下了”的“好”。影片中，李宝莉的“刀子嘴”更是被直接提升到了对丈夫马学武的男性尊严的践踏，甚至可以说是对人的尊严的践踏，[15]也因此，李宝莉的“好”和“悲”在电影中被弱化，她的“非女人化”女性形象，也被改写成了“泼妇”形象。

小说中，面对马学武父母的突然投奔，李宝莉先是心生怨气，暗自责怪马学武事先也不跟她说一声，和他起了口角之争，但过后，自己想通了道理，也就认下了，还主动把家里最松软的被子拿出来给马学武的父母用。但电影却删掉了这一重要的情节，呈现出来的效果就是李宝莉不愿马学武的母亲留下。在马学武的母亲凄然离去，儿子小宝随父亲追去门外时，李宝莉还出言劝阻。未果后，她还愤然摔下了手中的菜刀。后续，在为马学武的母亲铺床时，李宝莉看上去也是一副心不甘、情不愿的表情，带着不满与怒气。

电影如此删减情节后的结果就是，出轨的马学武变得情有可原，而抓奸的正义方李宝莉则变得不懂放手和成全。李宝莉的人生悲剧，也就变成了自己的“自作自受”，而不再是男权社会对欲要突破其机构体制的新型女性的打压。

此外，电影将马学武的父母削减到只留下马学武的母亲，将一个具有强势话语结构的家庭组织弱化成一个孤家老人，[16]并改写马学武母亲的“恶婆婆”形象，使其不再成为男权社会文化机制的推动建立者。同时，电影将小宝对母亲李宝莉的放逐局限在对其逼死父亲的仇恨层面，并删去宝莉连熬数夜，照料生病的婆婆，致腿伤加重，留院治疗；宝莉为筹儿子学费，几次三番地暗自卖血；宝莉被客户无端辱骂等重要情节，其目的都只有一个，就是将一

[14] 方方. 万箭穿心[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286.

[15] 参考知乎“如何评价电影《万箭穿心》？”答主李婉儿，详见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0951553

[16] 参考知乎“如何评价电影《万箭穿心》？”答主李婉儿，详见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0951553

个深层次的女性悲剧淡化成夫妻性格不合下所引发的家庭矛盾。[17]

电影如此巧妙的情节过滤，营造出一种仍是讴歌女权主义、呼吁男女平等的主题假象，但实质是，其内在隐藏的仍是男权话语中心。这就正应了约翰斯顿所说的那句话:“在性别歧视的意识形态和男性主导的电影中,妇女被表现为对男人有意义的形象，尽管它极其强调妇女作为景观的重要性，然而很大程度上，作为女人的女人依然是缺席的。”[18]

影片中，李宝莉最终也没有走向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而是开始真的迷信，将自己的人生悲剧归咎于“自己这个人命就不好”。就连小说中的配角，打字员的女性形象都在电影中被全然改写。小说中，打字员明显是怕丈夫的。当与马学武出轨被抓，马学武再次联系她时，她说，“你莫来撩我。我老公晓得了，会打死我的。”[19]但在电影中，打字员周芬却失去了对丈夫的畏惧心理。同样是出轨被抓后的再次联系，她和马学武相约在面馆一同吃面，马学武问她：“你老公不会说什么吧？”周芬一脸淡然，一边倒调料，一边说：“我出来吃早饭，碰到以前的同事，有什么问题啊。”如此一来，影片中男权文化对李宝莉这样的新型女性的压抑，在表象上，就被消解掉了。

不过，电影在李宝莉的新型女性的形象建构上，有着为小说所不及的亮点。小说中，李宝莉因遭到儿子小宝的当面威胁，所以，在面对建建的一再追求时，采取的都是逃避的态度。她压抑了自己的正常情感需要，更谈不上与建建发生肉体关系。在这一点上，小说并未突破男权社会意识形态下，社会大众对丧偶女性的道德要求。但电影中，建建在车中要求与李宝莉发生关系时，李宝莉先是抗拒，过后便转为了迎合。发生关系后，李宝莉依旧按部就班地过着自己的生活，面对建建的当面挑逗，她也表现得较为坦荡从容，使得建建不由得感叹道：“我在里头十年，现在外面变化这么大啊！这么时髦这么开放！完了跟没事一样！”随后，李宝莉回的一句：“滚，招老子心烦”也确切地暴露了李宝莉虽有身体欲望，却不愿直接承认的烦躁。[20]电影对李宝莉的这般形象改编，是对原著女性形象的一种超越。它肯定了丧偶女性的正常生理需要和情感需要，而不再将其视为道德上的污点。

结 语

在中国影视剧中，女性形象从一开始的温良贤淑、知书达理、逆来顺受，到旧社会中受苦受难的被救赎者，再到后来的天使与魔鬼的二元对立（即影视剧中常见的傻白甜女主和腹黑恶毒的女二），再到现如今所谓的大女主或是新时代独立女性，女性形象虽在发生变化，

[17] 参考知乎“如何评价电影《万箭穿心》？”答主李婉儿，详见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0951553

[18] 休·索海姆，艾晓明、宋素凤等译.激情的疏离[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55.

[19] 方方. 万箭穿心[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225.

[20] 张瑶. 社会的文化转型与人物的“万箭穿心”——电影《万箭穿心》的文化考量[J].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3,(01):86-90.

但塑造女性形象的主导力量却始终还是男权中心话语。只不过，一开始，影视剧中的男权中心话语是显而易见的，而现在，它以更为巧妙而隐秘的方式得以呈现。它被披上了女性主义的面纱，营造出一种女性电影的假象，借此打入女性电影市场。而电影《万箭穿心》，无疑就改写了小说的文本主题，属于后者。它虽展现了女性的生存困境，但其背后的操纵力量仍是男权文化。

参考文献

[1] 刘川鄂，黄耀芳.《万箭穿心》:小说与电影[J]. 扬子江评论，2014，(03)：26-29.

[2] 方方.万箭穿心[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221，201，198，197，286，255.

[3] 休·索海姆，艾晓明、宋素凤等译.激情的疏离[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55.

[4] 吴雁琴. 方方小说《万箭穿心》的叙述策略[J]. 名作欣赏，2012，(21)：50-51.

[5] 金堂.“纵是万箭穿心,也得扛住”[N].文学报，2007-08-02.

[6] 后窗四人谈之八.《〈万箭穿心〉之电影与文学》[N].新华副刊.2012-12- 20.

[7] 参考知乎“如何评价电影《万箭穿心》？”答主李婉儿，详见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0951553

[8] 张瑶. 社会的文化转型与人物的“万箭穿心”——电影《万箭穿心》的文化考量[J].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3,(01):86-90.

The theme change from the novel to the movie
——On the film and television adaptation of Oath Of Death

Peng Xiaohua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 Hunan, 410000)

Abstract：On the basis of the source of Fang Fang's creation,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theme change of "Oath Of Death" from novel to film from three aspects, and finally draws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movie "Oath Of Death" seems to show a female image, but the control behind its narrative is still the center of male discourse.

Keywords:"Oath Of Death"；theme；change